

1992.10.02

## 我从来没觉得“老”

◎ 冰心

宫玺先生:

您来信要我写《论老年》,我想来想去,无从下笔。说实话,我的朋友中,老人不多,最老的也比我小几十天,他们在写作上也都没有停笔,如夏衍、巴金、萧乾等。其他的都是我的小朋友,从五六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。他们和我谈话或写信,虽然也有愤世嫉俗、忧民忧国的话,但还都是朝气勃勃、天真乐观,我们从来没有提到一个“老”字!至于我自己呢,和儿孙们在一起谈笑,也没有关于“老”字的话。我不聋、不瞶,脑子也还清楚,除了十年前因伤腿,行动不便,不参加社会活动之外,我还是照旧看书写信,而且每天客人不断:老的、少的,男的、女的,他们都说我精神不错,脑神经也不糊涂(我倒是希望我能糊涂一些,那么对于眼前的许多世事也就不会过于敏感或激动)。我常常得到朋友们逝世的讣告或消息,我除了请人代送花圈外,心里并不悲伤。我觉得“死”是一种解脱,带病延年,反而痛苦。我自己的医疗关系,是在“北京医院”,我照例每月去检查一次,大夫们都说我没有什么大毛病,也照例给我开一点药带回。

我居然能够活到九十一岁,是我年轻时所绝对想不到的!我母亲说,我会吐奶时就吐过血,此后的五六十年中,多多少少的,总是不断。

总的说来,我自己从来没觉得“老”,一天又一天地忙忙碌碌地过去,但我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,说不定哪一天就忽然死去。至圣先师孔子说过:“自古皆有死”,我现在是毫无牵挂地学陶渊明那样“聊乘化以归尽,乐夫天命复奚疑”。祝好!

冰心

1994.08.15

## 写景

◎ 汪曾祺

写景实不易。

郦道元《水经注·三峡》:

自三峡七百里中,两岸连山,略无阙处,重岩叠嶂,隐天蔽日。自非亭午夜分,不见曦月。

我曾三过三峡,想写写对三峡的印象,但是无从措手,只写了一首绝句,开头说“三过三峡未有诗,只余惊愕拙言辞”,然而郦道元用了极短的几句话,就把三峡全写出来了,非常真切,如在目前,真是大手笔!

柳宗元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》:

潭中鱼可百许头,皆若空游无所依。日光下澈,影布石上,佴然不动;俁尔远逝,往来翕忽,似与游者相乐。

这写的是鱼,实际上写的是水。鱼之游动如此,则水之清澈可知。这种借鱼写水的手法,为后来许多诗文所效法,而首创者实为柳宗元。

苏轼《记承天寺夜游》:

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。

这写的是月色,但不见月字。写此景,不说出是何景,只写出对景的感觉,这是中国的传统方法。自来写月色者,以东坡此文写得最美。

中国人写诗文都讲究“炼”字,用“未经人道语”,但炼字不可露痕迹,要自然,好像不是炼出来的,“自下得不觉”。姚文“负”字、“烛”字、“居”字都是这样。“居”字下得尤好。

写散文,多读几篇古文有好处。

1994 年 5 月 9 日

2009.03.02

## 幽静的小楼

◎ 莫言

第一次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那座幽静的小楼,是 1999 年初冬。那时我刚转业不久,也许解放军文艺社的人感觉着我还是一个军队作家,所以让我跟着他们去上海采风。

那时的上海,已经发生了巨变,尤其是浦东,起了那么多的高楼大厦,修了那么多的文化景观,繁华而现代,喧嚣而热闹,令人眼花缭乱,流连忘返。但我更喜欢绍兴路那样的环境,那样的氛围,有几分寂寞,几分冷落,几分凉意,是一种很文学的感觉。

小楼下有一棵很大的树,虽初冬但未落叶,庞大的树冠,笼罩着小楼的阳台。阳台上有桌椅,好像是白色的。记得有一个女编辑对我们介绍过这几把椅子上曾经坐过的风流人物,张三李四,俱往矣,遂生出无限感慨。这绍兴路 74 号,是个挺适合怀旧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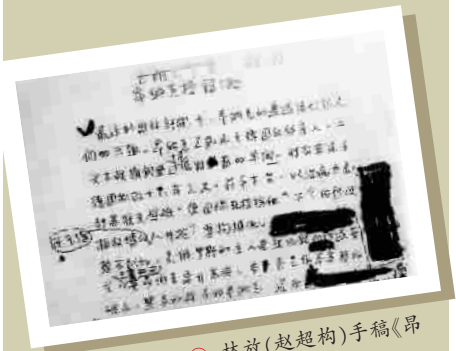
就是这次,认识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诸多优秀人物。

跟我关系最“铁”的,还是郑宗培兄。此人豹头环眼,南人北相,乍一看似个莽汉,交往久了才知道端详。2004 年末,我们一行十余人,组成一团,去日本北海道采风。相处十几日,方知郑兄是个敢于做事、善于做事,既有胆识而又思维缜密的人。他豁达幽默,常有奇态,与之同行,其乐无穷。我们此行的记录,就是那本图文并茂的《莫言走笔北海道》。文章是众人写的,书名却让我一人掠美,惭愧。文是美文,景是妙景,只是主角形象稍逊,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了。

作家与出版社的关系,说到底还是与出版社里人的关系。人好社才好。



● 1982 年 1 月 1 日,《夜光杯》复刊。赵超构以“林放”为笔名撰写《暂别归来》,作为其杂专栏“未晚谈”开篇。



● 林放(赵超构)手稿《吊纳克搭错了船》(局部)。



● 1982 年 1 月 1 日复刊号上刊载谢晋《夜光杯抒怀》。



● 1985 年 11 月 5 日,柯灵《开明风格》。



● 2010 年 7 月 1 日,刊登吴冠中遗作《自家江山》。

2011.09.24

## 我们一直在企图接近先生

◎ 王安忆

今天,我们一起纪念鲁迅先生一百三十周年诞辰,不由地百感交集。

鲁迅笔下的人物,那些从普遍性中提炼再加以虚构的性格,至今还留存在我们的骨肉里,他们的名字成为一种人性的定义,就像西班牙塞万提斯的“唐·吉珂德”,或者法国福楼拜的“包法利夫人”,那就是“阿 Q”,我们称作“阿 Q 精神”。如今物质相当富裕,这个世界再不像先生看见过的那么荒凉,可是人们对幸福的观念,似乎还是在茫然中。

事情确是在一点一点变好,但是还没有好到先生所期望的那样,寻找和集合起最积极上进的力量,使人们生活最好的文明里。是我们努力不够,或者是先生的目标太高了?我们一直在企图接近先生,然而,我们写的还是没有先生好。是因为才分,还是思想的力度不够,更可能是性格的缘故,我们大多是轻薄的,缺乏严肃性,容易妥协和变通,于是就觉得先生过于苛刻,总是感觉到被一双失望的眼睛注视着。一百三十年过去,先生就像他自己写下的那个“过客”,走过鲜花,走过坟地,走向那无人知道无人走过的地方,我们呢,我们也加紧脚步,不要懈怠,朝着先生的期望走去。

2013.02.10

## 葵花朵朵

◎ 金宇澄

编辑来电话,请写一篇“年货”,我一吓,这两个字,过去是一句切口,30 年前,迎面走过来一个女青年对我讲,“年货”到手了吧,有了吧。我笑笑。女青年讲,笑啥呢,要么,今朝夜里去走一趟?我笑笑。

所谓“年货”,当时上海青年的理解,就是葵花籽,上海人叫香瓜籽。黑龙江农场,春天一种就是几十公顷,两个人民广场的范围种满了向日葵,初夏金黄一片,葵花朵朵向阳开,7 月之后,向日葵的金黄面孔,就全部发黑了,低头只朝地上看,因为籽盘里已经灌了浆,一天比一天重,到了秋天,农场的捷克收割机来收,一粒不剩,集中起来运走,据说可以提炼航空汽油。

春节准备“年货”,往往是九月中旬,收割机还未启动,每天夜里,靠八点钟,两人一组的青年,就自动出发了。工具简单,一只麻袋,一块搓板,一把镰刀。如果是一男一女的组合,往往是恋爱关系;两男的组合,是绝对强劳力,麻袋要备两只,摸黑走进葵花田,先要有思想准备,因为葵花与身高差不多,夜里的样子也差不多,走进葵花田,等于走进人民广场的游行队伍里。

2014.06.16

## 难忘一个人的响动

◎ 陈忠实

天明谢世有两个月了,他极具个性禀赋的形象和声音,时不时地就会浮现在眼前和耳畔。依着曾经来往时说话互相直呼名字而略去姓氏的习惯,我仍只说天明不带他的吴姓。

结识天明,电影是媒体,算来已经是 40 年前的事了。上世纪 70 年代初,我刚刚写成并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《接班以后》,被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编导们看中,约我改编电影剧本,便住进西影厂后边一排平房的招待所里,就和天明结识了。他尽管长我几岁,也不过三十出头,生龙活虎干脆利落的一个小伙子,说话特爽快。

转眼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。某天中午,一个陌生人找到我的办公室,自我介绍说他是天明的弟弟。我当即询问天明的近况。他告诉我天明仍滞留美国,不久即将回国,却是肯定无疑的事。我感到很欣慰。他很郑重地告诉我。是天明托他来找我说《白鹿原》改编电影的事。他说天明在美国已经读过此书,当即电告他找我商议改编电影的事。此时小说《白》刚出版不久,尚无人有改编电影的动议,我没有任何犹疑,便答应由天明改编电影,完全相信他能做成且做好此事。他说需要我写一纸改编电影委托书,正式合同待他哥哥天明回来后再办理。我遵嘱写了委托书,他很高兴地告别了。之后不几天,谢晋工作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来,说谢晋要将《白》改编电影。我便告诉他,已将改编权交给天明了。我信守诺言。再过了不几天,有关《白》书在内的所谓陕军东征的几部小说出了麻烦……

到我见到天明说到此事,大家哈哈一笑了之。这是第二年年末的事。

天明后来在北京重新开创自己的电影事业,成就卓著。几次回到西安,抽空找我,还说想做《白》的电影改编,依然是好事多磨更艰难成。

(囿于篇幅,本版文章均有较大删节。)